

| 内容提要 |

本文集收录了张杰教授自 1988 年至 2006 年在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共 28 篇,分为三编。第一编为方法论研究,着重从宏观上探讨了外国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的方法,同时涉及了语言全球化等一些理论问题;第二编为俄苏文论研究,主要分析了原苏联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巴赫金、洛特曼等人的理论思想,还深入发掘了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的价值;第三编为欧美文学创作研究,不仅有对 20 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的宏观考察,也有对高尔基、托尔斯泰以及美国后现代作家德里罗创作的文本分析。

本文集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方法论的探讨,力求在外国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的研究中探索出新的途径。

| 总 序

去年末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杰院长向我谈及他和同事们正在筹划出版一套博士生导师的文库，作为对该院院庆十周年的献礼，顺便邀请我为该书写个总序。我当时只考虑到多年朋友，盛情难却，便贸然答应了。如今我拿到全部书稿目录并拜读文集作者的前言后，才发现文集所涉及的学科面又广又深，远远超过自己所知，自愧“墙上芦苇根底浅”，不宜担当如此重任。对我来说，应该认真学习，日后交份读书报告才是。但临阵脱逃，为时已晚，现只能匆忙上阵，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感受一：列入本文库的作者有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九位博士生导师，从学科搭配、梯队建设、科研成果来看都是令人满意的。自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设立博士点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博士点时有增加，还有些高校正在申请中。对这些博士点，老的、新的、未来的，如何评价？教育部蛮可派遣评估小组驻点调查。其实，不派钦差大臣而是从民间了解一下某校的博士点情况，也可知悉其一二。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库的出版是对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这几年工作的最好检阅。但我想得更远，近年来国内外大谈中国的崛起，这往往是以 GDP 为参照的。其实，物质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必作用于精神文明的发展。本文库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哪怕是很微小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高校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感受二：正如上面谈到的，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科研力量中，有文学方向，有语言学方向，有应用语言学方向，有翻译学方向，等等。过去有些学校强调本专业文学研究如何强盛，或语言学队伍如何壮大，或外语教学水平如何高，均失之片面。作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强。对教师来说，行行出状元，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持之以恒，都能做出成绩，因此，只有摆脱无形的和人为的比拼和学科的相互排斥，才能迈开大步往前走。在这个问题上，张杰教授和辛斌教授两位领导能团结同仁，摆正方向，教学科研一把抓，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呼唤和期待国内外语院校中出现更多的具有雄心壮志、视野开阔的领军人物。

感受三：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各位导师在科研中所走过的道路对我们颇有启示。例如，张杰教授擅长研究方法、俄苏文论和欧美文学；辛斌教授先后研究语义学、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批判语篇分析；姚君伟教授研究现当代美国作家赛珍珠和桑塔格；钱满素教授自英美文学转向美国历史和思想史，特别是美国当代社会思想；研究翻译学的吕俊教授从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又从解构主义走向建构主义；傅俊教授除英美文学外，填补了加拿大文学和文化的空白；马广惠教授对二语习得和相应的对比修辞、词汇教学和文体学情有独钟；倪传斌教授自述他的学术侧重点经历了四次变化，如从医学英语翻译实践转到翻译技巧研究，从翻译技巧研究转到外语教学研究，从外语教学研究转到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最后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转到学科前沿的神经认知语言学研究；黄和斌教授坚守语法学的阵地，但能结合当代认知语法学的动向。所有这些表明，我们的学者们是经历过多次转型而成长的；所有这些也表明，不同学科实际上是互相关联的，对一个新

的学科的掌握,有助于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发现新的切入点。用时兴的认知科学的话来说,在大脑中建立更多的知识模块的链接点,经过相互作用和激发,产生创新思维。因此,本文库的出版不仅是为院庆十周年献礼,或者为各位学者建立科研档案,更是通过文库与读者相互交流如何治学的经验,从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感受四:在我国高校中,经常出现科研与教学的矛盾,在科研上做得较好的,有时对教学不够热心;在教学上非常认真的,有时在科研上不够突出。在这方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导师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如傅俊教授注意在教学中与时俱进,获得学校的“教师育人奖”;马广惠教授将二语习得理论运用于修辞教学和写作教学;黄和斌教授的经验是先在英语教学与阅读中发现问题,然后查阅资料,再解决问题,完成科研。他又将部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中,“草根味”十足。可见,科研与教学是可以互补的、融合的,关键在于合理安排时间,妥善处理各种矛盾。

感受五:从九位博士生导师的发展轨迹来看,有三位是改革开放前受的高等教育(其中一位即将进入退休之列),其余均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培养。前者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也许会虚度此生,错过人生和学术的第二个春天;后者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受到良好教育,更应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并提供必要的进修、工作和科研条件。钱满素教授从研究文学转而着眼于探索社会本身,不是没有道理的。所幸,一当机会来临之际,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抓住了这个机会。这就取决于各位导师的事业心,而这又取决于他们个人对生活的追求、个人对社会变化进程和未来的理解和信心。

感受六:当我们畅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时,我不禁与傅俊教授一样,缅怀原系主任桂扬清先生和郝



振益先生(已故)。我有机会与桂扬清先生于1980年代中期共同参加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的工作,从前辈的文学修养和处事稳重中受益良多;我也应郝振益先生多次邀请来南京师范大学讲学和参加各种学术科研活动,他的学问和人品从此成为我的楷模。可以说,两位前辈和外语学院其他资深教师的勤奋耕耘和朴实学风,对教学科研的无比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积极培养,与兄弟院校的团结和谐,为今天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搭起了腾飞的平台。

教学与科研并重,传承与革新共存!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全体教师共勉。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

2007年7月15日



| 自 序 |

时光流逝,思绪茫茫。人过半百,是到该回顾反思的年龄了。记得 30 年前,“文革”结束、高考恢复,我们这些下放农村锻炼的知识青年激情澎湃,踌躇满志。作为高考中断 10 年后赶上第一班车的大学生,我们来不及抱怨各种运动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太多磨难,太多不公。我们实在是太珍惜青春时代的大学学习机会,我们真的舍不得让时光白白流逝。当时 22 岁的我甚至不愿等上半年,去选择自己酷爱的数学专业,而是服从分配进入了安徽师范大学的俄语专业,无论学习什么,只要让我上大学学习就行。因为赢得进入高等学府的权利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真的担心得而复失。

22 岁的年龄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是风华正茂的成长期,但是,对于一个外语专业的本科生来说,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外国语专业,显然是晚了许多。也许是班里同学大多数年龄较大,大家都十分在乎平时每一门课的成绩,我自然也不例外。为了分数,我努力地拼搏着,果然我每次的考试成绩很好,还在三年级时被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然而,为了分数而学习的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三位同学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并不差,但是我没有被录取,而录取的是其他两位同学。前来复试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张羽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他们并不太看重成绩,而

主要是重视研究能力,也就是写作能力和理论基础。那天晚上,天下着雨,我一个人漫步在长江边,雨水淋透了我的衣服,我发誓一定要重新站起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憋足了劲,花了两年时间,白天跟全日制班,晚上跟夜大,修完了中文专业本科的全部课程。终于在1984年9月,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成了张羽老师的研究生。我的文学研究生涯也由此起步了。从1986年在《艺谭》第2期上,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表演艺术分析的论文,至今也已经有21个春秋了。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良好学术氛围和独特的学术地位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87年7月,我获得硕士学位以后,仅过了两年,于1989年9月,我又再次考入外文所攻读博士学位,直至1992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六年的外文所学习时间虽然在人的一生中已并不短暂,但是我仍然依依不舍。一直到今天,我还忍不住要经常回“娘家充电”,甚至哪怕只要在那里呼吸上几口学术空气,也会感到心情舒畅。也许是这种情结使得我在十多年以后,把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开始往“娘家”输送。这里是我的起点,也是我不断更换起点的转折点。我感谢我在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导师张羽研究员,虽然在我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六年里,他一直担任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总是像慈父那样关心着我的成长,正是他的治学精神和谆谆教诲,造就了我的今天。师恩永志不忘。

曾记得第一次上导师的课,张老师就教导我如何治学。他提出看书不仅要知道书中写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要领悟作者是怎样撰写的,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手段。正因为如此,在我的文学和语言学研究中,方法论就成了我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也就很自然地形

成了本文集的第一编方法论研究。这里共收入了我从1989年至2005年间的11篇论文,也是从我数十篇论文中反复挑选出来的,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它们既有对文学批评方法和语言研究的宏观考察,也有对20世纪西方一些具体批评方法和理论的分析。《批评的转向》和《历史的循环》主要是力图宏观描绘外国文学批评方法运行的轨迹,而《从“形式”走向“认知”》则揭示了21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研究新转向。在《文学传统的解构》和《文艺学中的精神分析》两篇论文中,前者是试图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运用解构主义的方法,后者则是对精神分析方法的微观解剖。在此基础上,《21世纪批评方法的重建》和《更新思维模式,探索新的方法》是在努力尝试用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交往理论来重新构建文艺批评方法和翻译方法。《现代文学观念的裂变》则努力从文艺观念的迥异角度,区分了现实主义艺术与现代主义艺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此外,《语言全球化问题》和《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等均是从事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的宏观思考,也是国内对这些问题进行的较早探索。

从本科直至博士,我所学习的学科均是俄语语言文学,再加上我从小对数学就情有独钟,因此,研究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尤其是探究逻辑思维极强的俄苏文论,就成了我研究的起点和主要的中心之一,这便构成了本文集第二编俄苏文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陈燊研究员、钱中文研究员、吴元迈研究员、复旦大学的夏仲翼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宁教授和南京大学的陈敬咏教授等。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就不可能获得三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研究》1989年,《洛特曼及其艺术符号学研究》1997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研究》



2004年),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自己的研究。第二编共选录了11篇论文,其中8篇主要是围绕原苏联思想家、文论家、符号学家巴赫金、洛特曼和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展开的研究,这些论文的主要观点也较为详尽地表述在我的《复调小说理论研究》、《结构文艺符号学》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三本学术专著中。前两部是我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直接成果,也是国内最早的研究巴赫金和洛特曼的学术专著。后一部是我主持的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的成果。另外三篇是对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和俄罗斯哲学史的研究,也是我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前期成果。

本文集的第三编收录的9篇论文是针对欧美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是对俄罗斯文学创作文本的分析,其中第一、二篇《苏联文学及其研究:多样性与一统化》和《当代俄罗斯文坛现状》是对苏俄文学及其批评的整体考察。在我看来,缺乏整体的把握,就很难进行具体文本的深入解读。此外,具体分析作家创作文本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对高尔基心理创作艺术的研究,共有三篇,这是在我的硕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其他的《关于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变迁》和《心理分析艺术的深化——20世纪外国文学的一个主要倾向》均是我硕士论文研究的副产品,因为探讨高尔基创作的心理艺术,就必然会涉及一些相关的心理艺术比较和宏观考察。也许是我从小喜爱数学的缘故,我一直热衷于抽象思维和逻辑性强的理论分析,甚至与读文艺作品相比,我更爱读理论著作,仿佛只有理论著作的阅读才过瘾。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期间,张羽老师就曾经指出过我的弱点,因为没有大量创作文本的阅读,理论研究就会失去基础。第三编中的最后一篇《“散点”与“透视”——蒲宁中篇小说〈乡村〉思想艺术浅析》就是我在读硕士期间的作业,后来发表

在 1986 年第 4 期的《外国文学欣赏》上。

回眸 20 多年的文学研究生涯,我经历了从作品分析到理论探索的转变过程;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研讨中,又发生了从科学理论追寻到宗教批评理论求索的转换。近些年来,由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我又进入了语言符号学的研究领域,甚至开始招收文化符号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些变化也许与我的工作有关,也许与我的年龄有关,也许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无论如何,这本文集真实地记录了我的研究轨迹。它既是我前 20 多年研究的总结,也是未来研究的起点,而且是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其实,我们就是在不断更换起点中前进的,而学术的高峰却是永无止境的。

人过半百,研究的功利性几乎已经很少了,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仅仅是为了我需要研究。学术探讨已经成为我生命的需要,成为自我存在的满足。也许有一天,我停止了思索,停止了研究,我的生命也就即将到达终点。让我们为了生活而研究,为了研究而生活!

2007 年 5 月 4 日于南京随园



| 目 录 |

总序	1
自序	1
 第一编 方法论研究	1
21 世纪批评方法的重建	2
多一点问题,少一点结论	
——也谈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11
语言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	22
批评的转向:从语言学走向话语学	32
历史的循环:创作·批评·思维	40
从“形式”走向“认知”:21 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	
研究新转向	51
文学传统的解构	54
现代文学观念的裂变	
——论现实主义艺术与现代主义艺术的分野	66
重构历史的现实	
——20 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75
更新思维模式,探索新的方法	

论文艺学中的精神分析	95
 第二编 俄苏文论研究	105
复调小说的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	
——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106
批评的超越	
——论巴赫金的整体性批评理论	122
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非对话性	141
巴赫金与中国文学	151
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	
——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	155
走向体系研究的艺术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	
——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理论探索	167
叙事文本的“间离”：陌生化与生活化之间	
——洛特曼对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	
戏剧化分析研究	177
批评的反思	
——俄国形式主义研究的一点思考	190
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研究	201
真理的探索：从科学走向宗教	
——记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家弗洛连斯基	213
俄罗斯哲学史的多元主义阐释	
——评著名美学家斯托罗维奇最新撰写的	
《俄罗斯哲学史》	219
 第三编 欧美文学创作研究	223
苏联文学及其研究：多样性与一统化	224



当代俄罗斯文坛现状	237
心理分析艺术的深化	
——20 世纪外国文学的一个主要倾向	245
论高尔基的心理分析艺术	
——奥古洛夫系列小说艺术特色分析	255
现实主义心理分析艺术的拓展	
——《罗斯记游》艺术特色初探	267
论高尔基两部自传体小说中的心理分析艺术	279
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变迁	285
后现代社会的诗性特征：生活的符号化	
——《白噪音》文本的对话式解读	295
“散点”与“透视”	
——蒲宁中篇小说《乡村》思想艺术浅析	307
后记	315





第一编

方法论研究

21 世纪批评方法的重建^{*}

新旧世纪的更替,会给作为文学研究者们的交际方法——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的方法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是否能够在研究传统批评方法和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更符合时代变化和文学自身特点的批评方法呢?这些问题显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尽管在 20 世纪,这一被理论界称为批评的世纪,批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其基本的发展走向还是较为明显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的方法越来越趋向多元,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对话局面。然而,我们同时又注意到,这种“多元化”和“对话”的格局仅仅是就各种理论和方法之间的联系而言的,或者说这是一种理论和方法与其他理论和方法“外在对话”的“多元化”格局,而每一种理论和方法自身却还基本上处在自圆其说、自成体系的境地,缺乏与自我的“内在对话”。这样的状况就给当今世纪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留下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得不少批评理论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困境,如“语言表征危机”和解构主义的自我解构等问题。

因此,21 世纪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研究方法应该在继续“外在对话”的同时,走向批评和理论研究的“内在对话”。这就需要在对传统批评方法认识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新的批评方法。

^{*} 原载于《江海学刊》2004 年第 1 期。

一、思维范式的转换：从逻辑学走向现象学

在分析文艺现象,特别是文学创作时,文艺学界一直较为习惯采用的方法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对研究对象作因果式的纵向考察。虽然到了 20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以后,西方的文艺批评家们在仍然关注创作研究的同时,已经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创作的文本,后来又转向读者的接受。这种以逻辑论证为特征、以解决某一主要矛盾为任务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来说,无论如何都还是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科学归纳法相一致的。

自然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简单地说,属于一种逻辑学思维或科学思维范式,其主要特征就是寻找研究对象间的共同点,排斥不同点,通过归纳、论证、演绎,寻找到它们中间的某种确定的因素,从而指出对象的本质,或得出公式,或归纳成定理等结果。这种研究成果往往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传统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难道不也是在努力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竭力归纳出作家创作中的某种确定的因素吗?例如,从文学创作实践的研究来看,这位作家创作的思想内容是什么,艺术风格怎样,究竟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还是属于现代主义的,等等;从文学理论的探讨方面考虑,文学的特点是什么,文学创作具有哪些特征,等等。显然,传统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往往都是采用科学思维范式来考察文艺现象,特别是在结构主义那里,这一倾向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构主义几乎完全排斥了作品之间的差异,寻找着一类作品所共同拥有的结构,促使着西方文艺批评,尤其是文本批评走上了语言学、语义学批评的道路。

然而,人类自具有独立的思维能力以来,就拥有着各种各样的思维范式。与逻辑学思维范式不同,还存在着另一种思维范式,即现象学范式。这种思维范式不同于逻辑学思维范式,它并不过分



注重由逻辑推理得出的研究结果,却更注重探讨和感受过程本身;它不只是对研究对象的某一中心侧重分析,而是要对所研究的客观现象本身作整体把握;并不是努力揭示复杂现象间的共性,而是区分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个性,从而探讨这些现象产生的非规律性和偶然性。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学范式与逻辑学思维范式相比较,更适合于对文艺现象的把握,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是艺术思维范式,是艺术研究方法的基础。

解构主义之前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是采用逻辑学思维范式,或者说是科学思维的范式来探讨文学现象的。解构主义确实较前人来说有所前进。它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既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又否定了本文的“神学意义”,还提出了“语言的表征危机”。解构主义认为,作者并不能够完全主宰作品,作品一旦写成,就已不再受作者的控制,本文的意义存在于作品与读者的交流之中。由于批评视角的转换,解构主义者不再把文本的意义视为归一、确定和完成的,而是看成多元、不确定和未完成的。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开始不自觉地运用艺术思维范式重新认识艺术世界。但是解构主义自己却还是跳不出科学思维的范式,它仍然在用它自己认为不确定的语言来科学地论述自己的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境地。文学批评若要走出“表征危机”的误区和自我解构的境地,就必须彻底转向现象学思维或艺术思维范式,重新构造符合艺术自身特点的批评方法模式。

其实,在任何研究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应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应该是与研究对象相一致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等是文艺现象的主要特征。传统的文艺批评用科学归纳法对艺术现象进行因果式分析,得出某个确定的结论,显然是不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思维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文艺批评和研究的简单化。例如,我们的文艺批评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作家创作,都会对它进行科